

环境政治学译丛

绿色国家： 重思民主与主权

[澳]罗宾·艾克斯利 著
邹庆治 译

**The Green State:
Rethinking Democracy
and Sovereignty**

山东大学出版社



绿色国家： 重思民主与主权

詹姆斯·C. 斯科特 著
程立华 译

**The Green State:
Rethinking Democracy
and Sovereignty**

中信出版社·新思文库



环境政治学译丛
Environ-Politics

绿色国家： 重思民主与主权

The Green State:
Rethinking Democracy and Sovereignty

[澳]罗宾·艾克斯利 著
郇庆治 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内容提要]针对大多数环境学者和环境主义者都把主权国家描述为无所作为的政治行为体,或是造成持久性生态破坏的政治“主谋”或“共犯”的观点,本书系统阐述了一种绿色民主国家如何成为古典自由民主国家、不加区别地依赖增长的福利国家和新自由主义市场取向国家的替代性选择,并认为这是一种“介于漫无边际的政治想象和对现状的无原则屈服”之间的现实性立场。在作者看来,尽管正在发生着源于经济全球化的经济与社会重大变化,国家依然是应对环境难题的主要政治制度。由于国家仍是全球秩序的维持者,因而国家的绿化是国内与国际政策和法律绿化的重要步骤。绿色国家将力图把环境运动的道德和实践关切与当代的国家、民主和正义理论连起来,而其方法论基础则是借助“批判性政治生态学”来扩展道德共同体的边界,从而将人类共同体内嵌于其中的自然环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色国家:重思民主与主权/(澳)艾克斯利著;郇庆治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4
书名原文:The Green State: Rethinking Democracy and Sovereignty
ISBN 978-7-5607-4572-5

I. ①绿… II. ①艾…②郇… III. ①国家—关系—环境保护—研究
IV. ①X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4195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720×1000 毫米 1/16 14.5 印张 211 千字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总 序

在当代世界中,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问题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被公认为是人类 21 世纪面临的最富有挑战性的难题之一。传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反生态本质或不可持续性特征已暴露无遗,而同样清楚的是,在从根本上改变智力支撑着现时代的物质主义生存方式的现代化思维模式之前,人类很难找到一条通向明天的现实道路。因而,人类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从未像今天这样需要挖掘与展现我们的理论反思潜能:通过重新思考我们与周围自然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人类作为其中一部分而不是主宰者所应担当的适当角色,来重新构建一种可以使得人类长久地在地球上生存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意义上的生态学或“科学生态学”,而且需要(如果不能说更需要)人文与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生态学或“人文生态学”。沿着上述思路,我们才能正确理解正在蓬勃兴起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视野下的大量边缘性与交叉性新学科的意蕴,比如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生态营销学、生态社会学、生态人类学、生态文化学、生态法学、生态文学等等。就此而言,笔者所指称的环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也是这些形成中的诸多新兴学科之一。

环境政治的研究在欧美等西方国家主要集中在生态政治理论、环境运动团体和绿色政党三个层面,但从更一般意义上说,环境政治还可以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比如民族国家政府的环境管治及其政策决



策、环境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组织的跨国环境管治合作及其全球政治参与，等等。因此，从总体上说，环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还远未成熟，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都需要作深入的研究。

部分是基于环境政治学这门学科本身所具有的成熟性，部分是基于对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自身与时代特点的理解，笔者并不主张急于对环境政治学作出看似明确、实际上很可能制约其发展的界定，而是更愿意将其宽泛地规定为一种政治学视野下思考生态环境问题的新视角。具体而言，这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其一，环境政治学可以大致地规定为介于政治学与生态学之间的一门交叉性、边缘性新学科。依此，我们可以不必像对待传统学科那样过分在意它的学科独立性或“名分”，而是给予其充分的自由扩展与深化空间，这样可能反而更有利于它的学科发展与成熟。其二，由于生态环境问题明显是一个具有超出了单一传统学科研究对象归属的“超普遍性”和影响到人类基本价值认知的“深层次”问题，因而，只有以一种超越传统哲学与政治学框架的视野与开放性，才有可能突破原有认知与思维模式的局限，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环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反灰色的都是绿色的。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环境政治学在中国发展的切入点或突破口应着眼于以下两点：一是要坚持研究方法上的比较政治学观点或方法。这其中既包括不同学科视野下对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的比较，也包括世界不同地区环境政治学理论与实践的比较。对于前者来说，对生态哲学研究已有成果的消化吸收，是其他生态环境问题相关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学科的理性元点，环境政治学也不例外；对于后者来说，我们并不认为欧美等西方国家掌握着人类通向绿色未来的真理或“锁钥”，也不认为中国可以回避作为一个当今世界最大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历史责任与创造潜力，但我们的确认为，只有对欧美国家社会与经济生态化发展经验的分析借鉴才有可能成为任何绿色文明与社会创建的现实起点。二是要争取研究成果上尽可能广泛而及时的交流与分享。这其中一个基础性的手段当然是有选择地翻译介绍欧美等



西方国家学者在环境政治学领域的经典性论著,而它对于环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普及和中外学者学术交流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编辑出版《环境政治学译丛》是在上述两方面意义上的一个尝试,目的是推进环境政治学在中国的起步与发展。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呈现给读者的这一统一的“环境政治学译丛”(共12册)是自2005年开始陆续翻译出版的。2005年翻译出版了《绿色政治思想》(安德鲁·多布森)、《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戴维·佩珀)、《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克里斯·卢茨)和《欧洲执政绿党》(斐迪南·穆勒—罗密尔和托马斯·波古特克)。2008年翻译出版了《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默里·布克金)、《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萨拉·萨卡)、《当代多重危机与包容性民主》(塔基斯·福托鲍洛斯)和《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约翰·德赖泽克)。2012年翻译出版了《绿色国家:重思民主与主权》(罗宾·艾克斯利)、《环境与公民权:整合正义、责任和公民参与》(马克·史密斯、皮亚·庞萨帕)、《全球视野下的环境管治:生态与政治现代化的新方法》(马丁·耶内克、克劳斯·雅克布)和《全球环境政治:权力、观点和实践》(罗尼·利普舒茨)。之所以选择这些著作,一方面是由于它们都已成为当代环境政治著述中的经典性作品或“必读书目”,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分别展现了“环境政治学”、“生态社会主义”、“生态资本主义”等环境政治学整体或某一主要理论与实践流派的最新概貌。

当然,如果没有大量研究基金、学术机构和国内外同行所提供的帮助与鼓励,《环境政治学译丛》在最近几年内的连续编译出版是无法想象的。因此,笔者要特别感谢“中欧高教合作项目”、“德国学术交流中心—香港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项目、欧盟—中国研究中心项目、德国洪堡基金会、中国留学基金委员会,以及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项目“生态社会主义研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教育部人文社科



研究规划项目“西方绿色左翼政治思潮研究”(09YJA710046)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生态资本主义及其批评研究”(10BKS049)等所提供的主要财政资助。同时,在本译丛的编译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安德鲁·多布森、斐迪南·穆勒—罗密尔、戴维·佩珀、托马斯·波古特克、克里斯·卢茨、萨拉·萨卡、塔基斯·福托鲍洛斯、约翰·德赖泽克、罗宾·艾克斯利、马克·史密斯、皮亚·庞萨帕、马丁·耶内克和罗尼·利普舒茨等提供的各方面的热情帮助,他们为各自著作的中文版撰写了专门的前言,而且萨拉·萨卡先生还对自己的著作作了一些文献资料性的补充与完善。

同样重要的是,我的同事和合作伙伴刘颖博士、徐凯博士、张淑兰教授、李宏博士、蔺雪春博士、郭晨星博士、侯艳芳博士、郭志俊博士、杨晓燕博士、李慧明博士和博士候选人李昕蕾女士等,他们在从事繁忙的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先后承担了本译丛的翻译工作。在此,笔者一并致以最真诚的谢意。

最后,笔者再次感谢山东大学出版社对《环境政治学译丛》的出版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和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并真诚地希望,它能够成为我们共同期待的环境政治学研究在中国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起点。

郇庆治

2012年4月于北京大学

译者说明

严格说来,罗宾·艾克斯利教授是一位较为激进的环境政治理论家,大致属于环境政治学理论中的“生态主义”而不是“环境主义”支派。尤其能够体现这一思想主旨的也许是她更早些时候的专著《环境主义与政治理论》,因为该书的副标题就是“走向生态中心主义”。不仅如此,读者现在所看到的《绿色国家:重思民主与主权》一书,在更大程度上应该理解为是她试图把生态主义的政治思想引入主流的民主政治理论(包括国家主权理论)的一种努力,而不仅仅是借用生态民主的理念来革新现代自由民主制。换句话说,她理论思考的真正焦点是为生态主义寻找一种现实性的制度化道路和载体,而不仅仅是使现代自由民主制后现代化或绿化。很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听到译者准备在“生态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将这本著作翻译成中文出版时,她最初表现出的是有些疑惑。但我们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在现实生活中,反抗与重建当代资本主义和构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绿色社会将长期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

译者与艾克斯利教授相识于1999年的欧洲政治协会(ECPR)曼海姆年会。那时,她是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年轻讲师,而译者是受“欧盟——中国高教合作项目”资助在德国吕内堡大学访学的访问学者。由于时间短暂,译者只是借机表达了她的《环境主义与政治理论》对自己博士论文写作的学术启发与帮助。而当2010年夏我们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再次见面时,她已经成为世界知名学府国立墨尔本大学



的政治系主任，而且研究重点也从民族国家层面上的环境政治转向了全球环境治理与政治，特别是全球气候变化政治。她自己将此概括为：“从相对舒适惬意但较为封闭的绿色政治理论向更为宽泛与复杂的全球政治学的转型。”而译者的理解就是融入主流吧。

与已经出版的《环境政治学译丛》前8册一样，在翻译体例上，尽可能地忠实于原著是译者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即使个别地方可能因此而不符合中文习惯。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译者还对首次出现的人名、地名和部分学术短语等提供了其英文或母语的拼写。同时需要说明的是：一是译者没有将注释中的文献出处信息译成中文，而是保留了其英文样式；二是限于篇幅，译者只好忍痛割爱将书中的大量阐释性注释作了简化处理。

本书的翻译工作是在2011年的上半年完成的。春节后译者携女儿从济南来到北京准备她人生中的第一次“大考”，而这对译者来说则是在一种全新的时空语境下再次亲历高考。三十年前的高考对于译者来说早已化作一场永恒的记忆，而这个历时半年多的举家头号工程肯定将会为那历久弥新的记忆增添新的颜色与内涵。因而可以说，本书晦涩的理论言语背后，蕴藏的其实是父母在面对子女成长关键期时的所有焦虑、忐忑和欣喜，也应了那句俗语：生活使理论之树常青。

最后，译者要感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社专业的2010级研究生们，他们不仅饶有兴趣地投入到了译者首次开设的《西方环境政治学专题》课程，而且通读了本书译稿的初稿并提出了很好的校对意见与建议。而对于定稿中很可能依然存在的诸多谬误之处，则理应由译者负责。

译者

2011年6月于北京大学

中译版前言

在本书初版七年之后，全球生态环境仍在持续走向恶化，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仍在继续增加，并在 2010 年达到创纪录的 330 亿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真正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而且很少有发达国家在 1992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切实努力以承担起气候领导责任。始于 2007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阴云不散，意味着大多数发达国家首先关心的是它们的主权债务而不是其全球环境责任。

基于上述并不怎么有利的背景，中国已开始采取措施来解决其环境难题。无疑，最近出台的国家“十二五”规划(2011~2015)是迄今为止最“绿色”的一个全国规划，因而它标志着向低碳经济转型的一个更认真努力的开端。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经济高速增长期。而如今，她决定适当减缓其增长速度，把更多精力放在有质量的发展上：关注生活质量、社会安全与福利、研究与教育、技术革新和高新技术发展，并推动经济向高附加值制造业和服务业经济的转型。与此同时，中国还公开表达了削减能效、新能源和单位 GDP 排放密度的承诺，并为此关闭了大量技术落后的煤动力工厂。尽管做了上述方面的努力，但由于中国能源构成中对煤的高度依赖，煤炭在未来很多年中仍将是中国的主要能源，相应地，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仍将继续上升。

前文提及的绝大多数措施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生态现代化理念的不断强化。自 2004 年以来，中国显然已经成为一个比以前更“绿



色”的国家(像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但离笔者所界定的绿色国家还有很大的距离。在本书中,笔者详细区分了生态现代化“强势的”和“弱势的”的不同变种,并把强势的或反思性的生态现代化作为绿色国家的一个基本标志。如果说前者仅仅导致追求一种既定目标的更有效手段,那么,后者则导致对进行中的现代化的目的与手段的批判性反思,以便能够维持人类社会持续繁荣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对生态系统和生命支持过程的保护以及对人类自我繁殖、安康生活和有尊严生活的社会条件的维护。反思性生态现代化必然蕴涵着一种对生态与社会风险的预警原则、社会平等主义和更加包容与民主的决策风格。此外,它还要求充分意识到和承认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全球性后果。

世界的未来依然充满着不确定性,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人类易犯错误的特性。对绿色国家和绿色社会的探求,不仅仅是为了提高生态效率或解构经济增长与环境破坏之间的关联,还包括通过已经展开的质疑与批判性反思、民主审议和政策试验调整来创造集体性社会学习的条件,从而使我们不至于错误地毁坏我们集体性生存的自然源泉。

罗宾·艾克斯利
2011年9月于墨尔本

前 言

本书是笔者以现行的制度架构作为出发点，却立志于超越既存的环境管治视野的努力。笔者曾长期从批判理论中获取教益，而这一次则是试图将一种与众不同的绿色视点注入批判理论的内源性批评方法。

鉴于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已经转向了没有政府的管治和很多激进环境主义者的反国家主义立场，笔者以国家作为分析中心的论点在某种程度上显然是改良主义的。但是，随着绿党脱离政治边缘而走向政治权力的中心（比如，有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新西兰绿党与澳大利亚绿党正在迅速崛起），我们也许有必要思考，如何拯救国家或将其重新改造为一个民主的公共权力之所。尽管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但国家仍是全球秩序中的决定性成员，而这也使得笔者觉得更有必要构建一种新型、实用的“好国家”愿望。在本书中，笔者将致力于构想一个与众不同的绿色民主国家，以替代古典的自由民主国家、无条件依赖增长的福利国家和日渐占据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竞争国家。而这一工作也使我们合理追问，究竟什么样的国家可以促动国内外层面上更加主动与有效的生态公民权和更加明智的环境管治。至少，一个“好国家”可以促进法治与分权、消除腐败和推动对于落实生态公民权而言至关重要的公民与政治权利。然而，一个绿色国家还应包括哪些特质呢？它还应当实现和担当哪些目的与角色呢？那些在20世纪70年代初有关增长极限争论之后探讨这一问题的少数政治学



家,得出了一种生态极权主义国家的结论。然而,这种严格掌管资源与能源配置并且对消费、生产、人口和技术实施诸多约束的国家观念遭到了几乎所有人包括环境主义者的敌视。既然如此,一种绿色的民主替代选择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不同于自由民主国家呢(比如在角色、理论依据和功能等方面)?而且,这种孕育于现存的、并不怎么有利的全球背景的绿色民主国家的前景又如何呢?为了探究上述问题,笔者将参考、借鉴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的诸多学科,其中包括政治理论、社会学、国际关系学和全球政治经济学等。

这本书是笔者过去七年研究的主要成果。在此期间,笔者的研究重心经历了从相对舒适惬意但较为封闭的绿色政治理论向更为宽泛与复杂的全球政治学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笔者得到了许多同事和朋友的热情帮助,他们往往是通过他们的亲身实践而不是有意为之,将我带入了一个对于环境管治的未来有着重大影响的、充满挑战与刺激的智力领域。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克里斯·鲁斯—斯密特(Chris Reus—Smit)和保罗·詹姆斯(Paul James)。前者为笔者引入了批判理论的建构主义向度,并且不遗余力地支持我的学术探索;后者促使笔者更多地思考“民族国家”的民族侧面,并且热情地鼓励我的写作计划。而在本书稿的撰写过程中,他们向笔者提供了大量的批判性反馈意见与建议。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斯蒂芬尼·特里格(Stephanie Trigg)、保罗·詹姆斯和乔尔·特里格(Joel Trigg)分担了笔者很多的餐饮与幼儿看护工作。约翰·德赖泽克(John Dryzek)总是乐于倾听,并愿意提供各种建议,是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此外,笔者还要感谢罗布·瓦茨(Rob Watts)在百忙之中对书稿所提出的极富洞见的评论与建议。

笔者感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重建澳大利亚制度项目”。受它资助,我于1996年在那里休了一段时间的学术假,并在那时大致确立了本书研究的框架。而莫纳什大学则在1998~2000年间向笔者连续三次提供了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的小额资助,使我可以持续地开展本课题的研究。同时,笔者还要感谢莫纳什大学政治学系的同事和研究生,



他们在过去数十年中的友谊与才智使我受益匪浅。此外，格里·纳格赞姆(Gerry Nagtzaam)在图书查询搜索方面、尼克尔·博德特(Nicole Boldt)在图书馆检索以及参考文献目录编辑方面为我提供了极其出色的研究帮助。最后，笔者墨尔本大学政治系的各位同事也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与帮助。

与麻省理工出版社的克莱·摩根(Clay Morgan)先生合作，始终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正如他在纽约大学出版社时帮助笔者出版《环境主义与政治理论》一书一样。同时，笔者还要向三位匿名审稿人表达由衷的谢意，他们为书稿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和中肯的修改建议。

最后，笔者要特别感谢皮特·克里斯托夫(Peter Christoff)——我最亲密无间的伴侣和在学术方面最具批判精神的批评者，他在从事繁杂的大型研究项目方面比我更为擅长。

目 录

第一章 导 言	(1)
一、为什么是绿色国家?	(1)
二、目标与方法:批判性政治生态学	(7)
三、创建绿色国家:一种限定性起点	(10)
四、三个核心性挑战	(12)
第二章 国家与全球无政府状态	(16)
一、环境现实政治与“公地的悲剧”	(16)
二、新自由主义、环境体制和难题解决方法的局限	(23)
三、批判性建构主义与社会学习	(28)
第三章 国家与全球资本主义	(44)
一、国家的衰弱?	(44)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福利国家与合法性危机	(45)
三、从福利国家到竞争国家	(54)
四、生态现代化:仅仅是一种新竞争战略?	(59)
五、全球化、可持续性与国家	(67)
第四章 自由民主国家的局限	(72)
一、缺乏反思性的自由民主国家?	(72)



二、对行政国家的生态批评	(74)
三、对自由民主制的生态批评	(79)
四、对自由主义的内源性生态批评	(88)
第五章 从自由民主到生态民主	(93)
一、生态民主：一种新视域	(93)
二、审议民主的直觉性绿色诉求	(96)
三、代表“被排斥的其他”：道德与认识论的挑战	(100)
四、代表“被排斥的其他”：政治与制度的挑战	(106)
第六章 民主国家的绿化	(117)
一、从生态民主到绿色民主国家	(117)
二、国家、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	(119)
三、绿色批评与哈贝马斯民主国家的重建	(127)
第七章 世界主义民主与跨国国家	(144)
一、民主管治的原则：归属对受影响	(144)
二、公社集体的抑或世界主义的民主	(151)
三、作为生态公民权促动者的跨国国家	(160)
四、个例推动的转型与榜样的力量	(167)
第八章 主权的绿色进化	(171)
一、主权的绿色进化	(171)
二、全球性环境法与政策的新进展	(178)
三、生态伤害、不干涉与生态负责的国家	(191)
结论 主权与民主协同努力	(202)